

义侵略东北政策的策划者、参与者和执行者。甚至可以说星野直树在伪满的历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的侵略史。

星野直树在1940年8月被召回日本，担任无任所大臣和企划院总裁，进入日本的核心领导阶层。他负责继续对华扩大战争和以东亚其他各地为目标的新的侵略战争的物资准备。1941年4月星野退出内阁，但并非完全解除公职，只是减少了他与备战有关的公职。但当东条英机于1941年10月就任总理大臣时，星野又接受了内阁书记官的职务，不久又做了企划院参与，从这时起他就开始与日本在1941年12月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的各种准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投降后，不可一世的星野直树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判为无期徒刑。可是，判决后不久即被美国释放，后病死于东京。

### 伪满首任和末任总务长官

张福麟

伪总务厅，作为伪满中央集权制的汇合点，即负责统辖伪满洲国所有的重要行政事务，为统一掌管关系伪满基本国策的规划和制定，是主要的立案、定案机构；负责对伪满中央及各部局联络、协调关系，是行政中枢机构；更全面掌管人事、预决算、统计和省市地方行政的总领导及弘报、宣传等事务，是综合管理机构。所以日伪统治当局奉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关东军还公开标榜这是“满洲国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既然伪总务厅位置如此重要，那么其首脑人物伪总务长官地位也非同一般。《满洲国现势》在“中央行政”中明文规定：“总务长官由

日本人充任，他是总务厅的事务长官，同时也处于全面辅佐国务总理的地位。应该辅佐的范围，不仅限于总务厅所管事项，更涉及到属于国务总理权限的所有事项”。伪总务厅长古海忠之曾坦率承认：“总务长官实际上是国务总理。”可见，伪总务长官绝非等闲之辈，非常人所能担任的。我们仅从首任和末任两位伪总务长官的简况，就可见其它了。

首任伪总务长官是驹井德三，1885年（明治18年）生于日本东京，本为滋贺县人氏。他在北海道帝国大学，专攻农科，写出《满洲大豆论》，作为农业学士的毕业论文，很引人注目。

驹井1910年即来到中国东北。当时正值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从沙俄手里获取了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正以“满铁”为中心，大力推进对“满洲”经营的时候，驹井初入“满铁”还是继续搞农业，除深入研究满洲大豆外，还就农业改良，农业一般状况以及优良品种的培育等做了调查研究和推进工作。

1911年初驹井参加了由参谋本部、陆军省、农商务省和“满铁”共同组织的联合调查团，他作为“满铁”的代表负责铁路、畜产、人文地理、卫生等部门的调查，重点去内蒙东部一带活动，历时半年多。第二年春季，他复又去内蒙活动，主要是落实“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主张，即要想在满洲得到真正的发展，必须保有满洲土地所有权；他前后花费两年半时光，因有“满铁”做后盾，终于取得了收购白音泰来的11万町步内蒙古土地的成绩，不仅获得后藤的赞赏，也为日本在满拓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此，驹井本人也十分得意，认为“这可说是移民问题的嚆矢”。满铁以内蒙这一土地为基础，成立了东亚劝业公司，伪清时期合并于满洲拓殖会社。白音泰来则成了“满拓”的发展母体。驹井在这一土地买卖的交涉中，不仅对中

国东北军政当局有深入了解，还掌握了许多张作霖与蒙古王爷关系的情况，包括其矛盾的内幕，更认识了许多东北军政人物，尤以和张景惠、于冲汉等人相交密切、契合。

1918年至1920年，驹井放弃了让他出洋学习的机会，坚决要求去中国内地做长途旅行，由“满铁”出资7万元，并配备了两名助手，深入中国内地，走访了400余个市县。调查的重点仍是中国的农业与资源，计划出版《中国产业研究丛书》，其中第一卷《中国棉花改良研究》的出版，这也正是他两年中国内地调查的成果之一。以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支那金融事情》、《马贼谈》、《日本外交秘话》、《新支那建设秘录》等书，他则被认为是“中国通”。

正当驹井在“满铁”的调查情报工作深入开展之时，也正是“满铁”对其未来抱有极大期望之际，1920年冬，由于外务省的恳请，他在保留“满铁”社员身份的条件下，以外务省嘱托的名义在亚细亚局工作五年，负责指导青年外交官从事东亚和满蒙外交工作的训练，并充当了对华经济顾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陆军省请他重来中国东北，和板垣、土肥原、石原等人共同策划奴役中国东北的诸种事宜，他被任命为关东军的财务顾问，又兼特务部长。驹井是“大陆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先后在东北调查活动达十余年，在此过程中，他不仅掌握了有关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情况，更形成了明确的“中国大陆观”。对此，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无论如何满洲必须从中国分离出去，尤其要想经营满洲，就必须使满洲独立，否则日本在满权益，就绝对不能保证。”所以他坚决主张炮制伪满洲国，在“建国”方针上，他又反对在新政权里只设少数日本顾问的做法，而干脆主张日本人做为日系官吏参加满洲行政工作，掌握人事、财政、军事、司法等各项大

权。这些主张和关东军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作为筹建“满洲国”的骨干分子，和“三原”（板垣、土肥原、石原）密切配合，坚决而又顺利地完成了组建伪中央政府的工作。伪政权中第一批日本官吏，以驹井德三为首共56名，早在伪满建国前的2月中旬，即已被内定，并在“曙”日本饭馆集会，由板垣征四郎宣布本庄繁司令官的任命，驹井德三就任总务厅长官。

驹井生性放荡不羁，曾充任日本在华浪人头目，作风强横跋扈，自恃在“满铁”多年，对东北情况了如指掌，十分自信，又加之深受关东军的信任和倚重，更是豪横十分，不把谁放在眼里。“满洲国”刚成立，他就和汉奸大臣们有一次正面冲突。3月12日，召开第三次国务院会议，议题是研究伪中央政府机构人员设置。每位大臣面前有一纸袋，里面装有机构人员表，表上列出国务院各部次长以及各部下属司长名单，凡中国人任职者标以黑圈，日本人任职者标以红圈。该表还在说明中标出日满人员比例为2：10。这是驹井和关东军有关方面早策划好的，拿到国务院会议上，只不过走个形式罢了。不料汉奸们对日系官吏参政反映强烈，张燕卿、熙洽接连发问，这下子惹恼了驹井，当熙洽质问：“这名单是谁指定的？事先并没有和我们各部商量，日本人直接充当满洲国官吏，这是件大事情，更应该先向执政报告！”这番话更激怒了驹井，他马上站起来，凶蛮的脸拉得老长，一边拍桌子，一边大声言说：“谁决定的？我告诉你这是本庄司令官决定的，现在满洲国是责任内阁，没有必要向执政报告……新建的满洲国根本离不开日本人的指导。”最后驹井又提高嗓门儿严厉训斥道，“你们知道满洲国是怎么来的吗？是日俄战争时，日本以十万颗头颅的重大代价，从俄国人手中换来的。尽管如此，我们日本人在建国伊始，还发扬谦让美德，只要求占有政府官吏的20%的位置，要知道，日本人就是满洲

国的主人，这是关东军的既定方针，谁要想反对，是坚决不行的。”驹井这带有严重威胁口味的話，一时镇慑住了在座的汉奸大臣，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了。会议也就在驹井的压力下，通过了任职名单，其实，会前驹井已令各部总务司长到职，就是说，这边国务院开会，驹井刚发布名单，那边各部、司已由日本官吏主持开始工作了。熙洽还有些不信，到财政部一看，果然一切工作大体就绪，不少日本人在办公，拿到他面前的公文，都说是驹井总务长官让办的，他做总长的职责也不过签字盖章罢了。看来，胳膊扭不过大腿，为个人前途计，熙洽又屈膝前去拜访驹井自行认错，驹井仍是毫不客气地训斥熙洽说：“你的财力有多大，来源是什么，又有多少兵力，这一切我都清楚。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别那么信口开河了。”

这段冲突虽以驹井占上风而告终，但他还是犯了众怒，积怨太多，各部总长都畏惧他，无法配合工作，其中尤以和“国务总理”郑孝胥矛盾最深。

驹井作为“总理”的副手，根本没把“总理”放在眼里，他独揽大权，自做主张，甚至常常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郑孝胥。郑孝胥也自恃“建国功臣”，代表溥仪和关东军签有密约，因此，对驹井的独断也有些不大买帐，久而久之，两人关系越闹越僵，到了互不谋面的程度，只要驹井来总务厅，郑孝胥便立即拂袖而去，闹得国务院会议都开不成。据古海忠之回忆，1932年10月，他们完成了“满洲国”最初年度总预算，等待国务院开会研究，会议却迟迟不开，原因不問自明，全总务厅乃至伪国务院都知道驹井总务长官和郑孝胥总理相互不合作。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已发展到公开化的程度。后来，郑孝胥竟闭居家宅，不理政务了，这引起关东军的关注。1932年9月9日，郑孝胥竟然提出辞去国务总理之职，这是郑瞅准机会，对关东军有意进

行的要挟，因为再过6天，即9月17日，他将代表“满洲国”和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正式签定《日满议定书》。在此关键时刻，关东军最需要自己。果然，事情被郑孝胥料中了，关东军最高当局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尽一切可能，全力挽留郑孝胥，并急忙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对郑孝胥进行说服解释工作，但郑孝胥责怪驹井总务长官太武断专行，不肯让步，冈村急得团团转，眼看签字决定书的日期临近，更换总理显然不合适，但郑孝胥坚决表示有驹井在总务厅，他就不能任总理。关东军只好舍弃驹井，答应郑孝胥在签署议定书之后，即将驹井调职，这样才使郑孝胥改变了辞职之意。

驹井德三，作为“满洲国”第一任总务长官，任职才7个月，就下了台。1932年10月5日，驹井改任伪参议府参议。1933年7月回国，但他的“大陆梦”还没做完，仍然热衷于日本的对满事务，曾相继任过康德学院院长、兴亚时习社学长等职，专门培养奴役中国东北的人才。

伪总务厅最后一任总务长官是武部六藏。武部六藏，1895年生于日本金泽市，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德语法语科。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曾获褒表奖，又在高等文官考试中名列榜首。在日本内务省中是首屈一指的才子，年纪很轻就出任秋田县知事，主持地方行政。1934年来中国东北，任关东局司政部长，1935年升任关东局总长，开始涉足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事务领域。1936年回国任日本企划院次长，1938年参与创立北支那开发会社，担任设立委员，1940年7月就任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满洲国”覆灭。

通过上述简历，不难发现，武部和驹井不同，驹井虽也是农业学士，且有多种有关“支那”的著作面世，但驹井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和武部有不同的经历，驹井生活在日本大陆政策

出台的前期，当时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分子积极煽动“满蒙狂”，驹井就在“开辟满蒙新天地”的鼓噪下来到“满铁”，积极参与名为“调查”实为谋略的情报工作，在走南闯北的游荡中，不仅造就了他喜好冒险、专横的性格，也培养了放荡不拘的浪人作风。而武部则完全不同，他是标准的日本上层官吏，东京帝大出身，在这培养官僚的摇篮里，使武部深明为官之道，深谙为官之术。如果说，在伪满初期，一切处于草创阶段，由驹井出任总务长官，大刀阔斧，专横跋扈，建立殖民统治新秩序的话，那么在“建国”十年之后，由精明的官吏武部担当总务长官，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和关东军的最佳选择。

在企划院的工作经历，奠定了武部六藏日后为官升迁发达的基础。他任企划院次长，负责日本国家重要计划的制定及日本国力判断的调查，这样，他就有机会广泛结识日本政界、财商界的头面人物，尤其在1938年受内阁之命主管北支那开发会社的筹建工作，更与当时的大藏大臣、日本财阀巨头池田成彬有了交往，还与日本金融界的巨魁结成丰太郎相识，以后他就成了三井和住友等财阀的代理人，成为日本经济圈内各大财团最可信赖的人物。

武部活动的天地很宽泛，他在军阀和官僚政客中也多有敬重的前辈和知己的朋友，彼此联系十分密切，如安部信行、东条英机、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木户幸一、河原田穉吉、后藤文夫、贺屋兴宣、汤泽三千雄、石渡庄太郎、青木一男、岸信介等，其中，东条英机和武部在关东局曾共过事，东条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兼任关东局警察部长，武部为关东局总长。彼此十分熟悉。总之，武部在日本上层统治者中，有广泛的交往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当星野直树被调回国另有任用时，经内务官僚汤泽三千雄等人推荐，立即得到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的同意，原来武部和梅津司令官也是老熟人，当武部任企划院次长时，正是梅津任陆军省次官时代，当日本内阁每周召集各省院次长（官）会议研究各省提案时，凡是陆军省所需要的物资提案，武部均以掌握物资动员计划的企划院次长身份，积极表示支持，与梅津友好配合。

武部六藏被任命为总务厅长官走马上任后，坚决执行星野直树一手炮制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百万户移民计划”这三大国策，并结合日本侵略战争不断扩大的形势，加紧了对东北的掠夺速度和深度。他刚一到任，有关农产品等问题亟待解决，他立即面请有关部门次长研究，对农产品收购及其价格，还有煤炭生产以及产业新体制确立等诸多棘手问题均一一获得圆满解决，一开始在日系官吏中就树立了精明干练的形象。在汉奸中武部也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他奉行的施政方针是“重视满洲人的心里安定”，尽量不激化矛盾，并千方百计采取钝化矛盾的办法，比如，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研究确定“国家庆典”节日时，增加了日本的祭祀节日，却把祭孔日取消了，结果在参议府会议上引起轰动，一些满系参议表示不满，纷纷对此提出异议。这使武部感到十分为难，只好宣布临时休会，会下他又仔细了解张景惠等人的意见，并和关东军第四课进行交涉，几经反复，终于获得关东军同意，几天后又开临时国务院会议，根据参议府意见，修改前次会议有关庆典节日的决定，又恢复了祭孔日，终于解决了问题。这件事情如此处理，几乎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在当时伪政权中普遍存在的“日籍权威”是不可抗逆的风气下，武部敢于这样处理，无疑是收买了满系官吏的心，使他们更加卖力地为武部服务。有时武部采取事先做工作，先堵嘴的办法，使矛盾不再发生。如伪满为解决军需劳力不足，准备实行勤劳奉仕制，在拿到参议



府会议讨论之前，武部就先请日系副议长吃饭，向他说明实行勤劳奉仕制的必要性以及因强征劳力可能要引起满系参议反对等话，要求日系副议长多做工作，一定要保证通过。后来虽然隔了一周开会时，众参议没有说什么，顺利通过了。

武部六藏对汉奸们基本上采用“威抚”两手策略，一方面他深知被奴役的众汉奸之畏惧心理，在国务院会议上多半以这是“日满共存共荣的需要”、“皇军圣战之必需”等理由压制众大臣强行通过掠夺东北物资的各种议案，甚或有时搬出杀手锏，说这乃是关东军司令官的指令等等，更是使众汉奸无容喙之地。另一方面，他又采用拉拢收买的办法，以特别机密费的名目控制一部份支出，专用来奖励各地伪省长，表彰他们在催逼“出荷”、摊派储蓄、强征劳工等工作上的成绩。每当伪省长会议开过之后，武部就个别召见一些伪省长，当面加以慰问和鼓勵，随后送给奖金袋一个以示褒扬。伪四平省省长曲秉善，1943年完成武部给预定的“出荷”粮80万吨，外加50万吨“报恩出荷”，1944年加一成，完成了90万吨，1945年预计再加一成，想完成100万吨。于是受到武部的奖赏，1944年春季获奖金伪币2000元，1945年春季伪省长会议时，由于曲秉善自报要再次提高出荷量，武部又奖给曲3000元。伪滨江省是北满的主要产粮省，出荷量也多，1943、1944年连续两年都完成了出荷任务，其中包括追加的报恩出荷在内，很得武部六藏的赞赏，先后给伪省长王子衡3000元和5000元的高额奖金。金名世出任伪吉林省长后，承担了伪满出荷的大数量，1942年交160万吨，1943年交170万吨，之后又出花样多加10万吨“报恩出荷”，在全伪满出荷粮占第一位，武部六藏奖给金名世特赏，赏表彰状一张，锦旗一面，奖金1万元。从此金名世成为武部最器重的省长，每月单给他500元的省长机密费，以示个别倚重褒奖之意。

随着日本对“满洲国”控制奴役的加深和加重，武部六藏感到仅有三大国策还不够，于是以纪念“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为契机，他亲自组织人力，经过一番策划，炮制了《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该《大纲》包括序言、根本方针、政治纲要、民政纲要和经济纲要等，对“满洲国”的政治、经济、民政等多方面的殖民治理做了系统的规划，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满洲国”殖民统治政策。与此同时，该《大纲》还附有不公开发表的附件，其中有《行政机构改革要纲》和《协和会刷新要纲》等，对战时形势下的政治和行政采取了非常手段。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对战时物资需求日益增加，于是他又制订了“物资动员计划”，更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物资的掠夺。

武部六藏不愧是帝国势力派的官吏，承办行政事务有条不紊，且有一定的政治远见，1941年末，他一方面忙于《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签订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一方面又约请伪国务院各部部长和总务厅次长等研究时局和对策，分析远东形势和日美一旦开战，“满洲国”应采取的适应政策。几天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满洲国”由于武部事先有上述准备，立即发表“政府声明”，颁发“时局诏书”，同时确定时局宣传方针、人心指导方针、对敌国民措施等，一些适应战争需要的施策，纷纷出台，使“满洲国”这架殖民机器，按部就班地运转，深得关东军的嘉许。

武部六藏除直接听命于关东军的指挥外，遇到十分重要而又需急于解决的问题，他就偕同关东军第四课课长一起去东京与日本政府联系请示工作，以便迅速而又全面地贯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据古海忠之回忆，武部六藏认为“从工作考虑，在满日本官吏绝对有必要了解日本国内的形势，日本政府的重要施策和意图，因此他每年至少要亲自去东京一次，去

了之后，一方面会见内阁要人、陆军将领，还要会见财界和商界首脑以及民间政治家们，商议满洲政策，了解日本国内的机密事项。回国后，他在一般情况下，均要召集临时日系次长会议予以传达和研究，规划“满洲国”相应的种种施策”。

武部六藏被三菱财阀巨头岩崎男爵招聘为女婿，这就决定了他和财阀们有利害相关的关系，在日本企划院时，他就积极为三菱财团谋利益，他任伪总务长官后，每年向日本国内输送100万吨铁矿石，主要是供给三菱系统的神戸“日立”制钢所，岩手县的“釜山”制铁所、北海道的“室兰”制钢所等，伪满又在武部规划下还要供给日本60万吨炼铁用煤和30万吨铁，炼铁用煤也几乎全部供给三菱系统的三个制钢所使用，而30万吨铁，则大部份供给了三菱系统的神戸、长崎两处的“川崎造船所”及其它制造军火的厂商使用。

从1941年起，武部将“满洲国”的鸦片拿到华北卖掉，然后用这笔鸦片款来购买开滦炼铁用的煤，每年90万吨，主要是供给三井、三菱、住友投资的福冈“八幡”制铁所用；同时武部还以卖鸦片的大宗钱款又在华北购买大批工业用盐，还是全数运往日本，也是用来供给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团共同投资组建的“大日本化药工业株式会社”。至于武部六藏在东北通过“出荷”强行掠来的粮食，也是委诸三井、三菱在满机构负责从海上向日本输送，三井、三菱财团不仅从中获得巨额的运输费，更因承担分配粮食的关系，又继续获得大批的经手费。

日本侵占东北后，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等财团纷纷来投资兴办企业，占据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总额三分之二以上。武部六藏就任伪总务厅长官后，对这些财团创办的会社又进一步予以扩大，增加了一些子会社，使其投资比重又加大了。

特别是在1941年后，武部又特许三菱在东北创设各种保险事业，特许三井在东北各地普遍开设收购土特产的机构，然后通过三井在哈尔滨、长春、奉天、营口、安东、大连等地的支店向日本及欧洲国家出售。还让三井承包将东北的鸦片和大豆、粮谷等暗中向华北出售以换取关东军所需的面粉、皮革和棉花等农副产品，使三井从中获取高额利润。武部在照顾日本各大财团利益时，还没有忘记住友财阀，本来住友已经在“满洲国”经营了金属工业及钢管生产等企业，但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伪满政府为满足军需，特拟制了“轻金属紧急增产计划”，武部亲自走访住友财团，把安东轻金属会社全权委托住友财团管理。

综上所述，可见武部不折不扣是日本垄断财团在中国东北的代理人。

武部为人比较随和，喜欢体育，爱打棒球、网球，也爱在冬天时滑冰。由他出面组成长官棒球队，以记者俱乐部的棒球队为对手，在伪中央银行的运动场上进行过比赛，在当时伪政府内很是活跃和融洽。故在日满系官吏中挺有人缘，平时待人接物，又十分谦恭有礼。张景惠说，他从未见过武部六藏发火。所以到日本投降后，众汉奸忙于组织治安维持会时，张景惠也没忘了他，拉上武部做了最高顾问。

武部作为末任总务长官，在落实日本对中国东北愈加苛刻的殖民统治和物资掠夺上，是毫不含糊，绝不手软的。他本人身为特任官，要由傀儡皇帝亲任，薪俸仅次于伪总理大臣，为1500元伪币，比伪各部大臣同为特任官高出200元。至于另外获得的津贴，特别机密费等还不在于内。另外除关东军司令官有官邸之外，在伪满政府中，也只有张景惠和他有官邸，他在实际待遇上，和“总理大臣”可说没什么两样。

以上我们介绍了伪满首任和末任两位总务长官，他们除性

格、为人和工作作风以及个人经历有明显不同，形成强烈反差外，在对伪满的殖民统治中所起的作用则是完全相同的，在关东军眼里，他们都是合格称职的“总务长官”，若说不同，只能说驹井德三为“总务厅中心主义”确立了基本框架，而武部六藏则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的发展，使之更精细罢了。

## 日伪政权垮台前后的武部六藏

王文铸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14年期间，伪满洲国的实际政治统治中枢是伪总务厅，武部六藏即是最后一任伪总务厅长官，也是任期最长的。1940年8月，武部六藏接任伪总务厅长官直至1945年8月日伪政权垮台为止，达5年之久。此期间正值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日伪政权走向穷途末路，面临灭顶之灾之际。武部六藏上任后，便公然规定强化总务厅中心主义，变本加厉地强化推行、重新制定各项殖民统治政策和法令，把伪满洲国牢牢地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车之上，在亚洲充当反苏、反共、反人民，发动侵略战争的小伙计，忠实地为法西斯殖民主义政策效力。3 000万无辜的东北人民处于更为残酷的殖民统治之下，东北被当作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桥头堡，献出了宝贵的物力和财力。武部六藏以牺牲中国东北为代价，为日本侵略者的垂死挣扎，效尽犬马之劳。

1893年1月，武部六藏生于日本长崎县，后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曾任县知事、关东局总长、日本内阁企划院次长代理总裁等。1940年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在其组建